

國中歷史教學的變局與因應

林麗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館國中歷史科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委員

一、前言

近十幾年來，我國政治社會環境丕變，教育新政迭興，國中歷史教育不論在課程、教材、考試制度各方面都有諸多變動。自八十六學年度起，國中逐年改用根據教育部民國八十三年發布之課程標準編訂的教科書，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新課程「認識臺灣」實施才一年多，教育部已公布「九年一貫課程總綱」，國中教育的教材、教法、學科分合，更面臨一次幅度空前的變革。數十萬國中學生固然首當其衝，必須面對一連串新制的挑戰，因而有身為「教改白老鼠」的疑慮；站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何嘗不是戰戰兢兢，時有無所適從的茫然？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筆者承邀編寫國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教材內容上起遠古，下迄盛清，涵蓋時代等於使用十多年的舊版教科書第一、二冊

的範圍，因此教材內容的詳略有相當大的變動。該書自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使用，經過一年的試用與研習，八十八年九月起使用「正式本」迄今。配合九年一貫新課程的實施，國中歷史劃歸「社會領域」課程，教材必須重編，而且開放由民間出版社編輯出版，因此目前使用中的國中教科書，將成為我國自民國四十一年以來最後一個「統編本」，已是確定的事實。

筆者有幸躬逢其盛，從教科書的編寫、使用到審定本的開放，對瞬息萬變的教育環境頗有深切的感受。爰藉此文略抒所見所感，希望筆者參與編寫教科書過程中的一些觀察與感想，可以略供站在教學第一線的歷史教師參考。

二、國族認同與「本國史」的教學難題

根據八十三年十月頒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國一「認識臺灣」雖有歷史篇，但「歷史」與「認識臺灣」是兩個不同的課程，國二開始才有「歷史」科。國中歷史分為「本國史」與「外國史」，其中「本國史」（第一、二冊）的教材綱要，除首尾的「導論」與「未來的展望」外，按中國史時代先後分成上古篇、中古篇、近古篇、近代篇、現代篇，因此，國二的「本國史」實際上是剔除臺灣史內容的中國史，現行國中歷史教材的整體架構是：國一學臺灣史，國二學中國史，國三學外國史。

不過，近年來臺灣本土意識日漸高漲，兩岸關係瞬息萬變，「中國結」與「臺灣結」的國族認同衝突日深。民國八十六年五月開始，輿論界對即將使用的新教科書「認識臺灣·歷史篇」連綿數個月之久的爭議，論者指出正是「對立的兩個國族主義（中國與臺灣）競逐制式教育管道發言權的結果」^①。八十七年七月四日，在一場建國黨主辦的「國中史地教材研討會」中，與會學者呂香盛對即將於九月實施的國中歷史第一冊新教材雖有若干肯定的意見，諸如「遣詞用句淺顯易懂，引進新研究成果，政治史比重降低，社會經濟史比重增加，課程趨向

活潑化」等，但呂氏也批評筆者編寫的這本新教材「屬於根本性的缺失卻未改除，最根本的部分在於仍以中國史為本國史。」^②他指出，以中國史為國史的課程設計，使臺灣只是中國的邊陲，完全沒有「臺灣本身的主體性」可言，因而「與當前臺灣優先為全民共識的社會主流價值完全背道而馳。」^③稍後，筆者在是年九月起各縣市陸續舉辦的教師研習會中，也曾有少數教師從強調「臺灣主體性」的立場，主張本國史教科書的編寫應該「去中國化」，批評新教材的內容不是「本國史」，而是「外國史」中的「中國史」。眾所周知，教科書的課程架構與內容要點係由教育部訂定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所規範，並非編者個人意向所決定。我們仔細對照「課程標準」「本國史」的課程綱要，可以發現前述所謂「根本性缺失」，其實是批評者與國家政策在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互相衝突的反映。

國中歷史第一冊實施迄今，雖沒有引爆像八十六年「認識臺灣·歷史篇」那樣激烈的國族認同論爭，但隨著首次政黨輪替的到來，民進黨政府主政後，兩案政策與國家定位的爭議有增無已，歷史教科書的「本國史」架構與政治現實、社會大眾的認知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卻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站在教學第一線的國中老師，

面對一群國族認同甚至文化認同各自歧異的青少年學生，教學時難免遇到困擾，甚至感到灰心。這一困境其實是現階段我們國家全體的難題，短期內似乎尚難有解。筆者以為，當前的本國史教學宜暫時擱置中國／臺灣兩個對立主體的爭議，以現行部頒課程標準所界定的架構為規範，但可將中國史的教學重點放在了解「臺灣文化的中國傳統」上面，減少歷代帝王政治更迭的細節陳述，而著重於本國史的文化史教學。

所謂文化，不僅指食衣住行、風俗習慣等日常生活，也包括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的創造，以及意識型態、價值觀念、社會心態等方面的表現。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教授曾借用考古學「文化層位」的觀念，分析臺灣文化的歷史發展，先後有原居民文化、中國常民文化、日本文化、近代中國的士大夫文化、西方文化。許院士指出，這幾個疊壓的文化層中，最底層的原居民文化，只在現存的幾個原居民族群中可以找到；日本文化雖相當程度地改變了臺灣文化的風貌，但只有在一批特定的少數人口（擁有特權的皇民階級）中有其不可磨滅的影響。至於西方文化層則因為臺灣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化，竟與中國近代文化層與日本近代文化層呈焊接滲透之勢。其中最深厚而持久的一層是中國常民文

化，不論是民間信仰或藝術風格，中國常民文化歷經數百年的積澱，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其上層的後來文化層，層層疊壓，卻不外是局部的，或是薄薄的覆蓋一層而已。^④無論是基於歷史事實的了解，或是紓緩國家認同爭議引起的國史的界定問題，當前國中的本國史教學，若能從「傳統中的生活，生活中的傳統」的文化層觀點，著重講授中國文化史內容，不僅比較有說服力，也較具親和性，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應是比較易於落實的教學方向。

三、教改浪潮與歷史教學的變局

近年來，教育改革新政迭出，嚴重衝擊舊有教育體制，即將推行的九年一貫課程更有教育界「寧靜革命」之稱，歷史科劃歸「社會領域」課程，教科書由統編本開放為審定本，凡此，不僅直接牽動國中的課程架構，影響各校歷史教師的教學時數與人力調配，大學歷史學系的教學目標與課程設計也勢需有所調整，以因應歷史教師培訓與社會領域課程師資結合之需要，對我國教育環境衝擊層面之廣，真可以「大地震」形容。學術界與社會輿論固然對這一教改大工程的相關配套措施咸感不足，以致心生疑慮，多所針砭；站在教學第一線的國中教師對近年來教科書的更易頻繁，尤覺壓力

沉重，難以適應。

筆者接觸的現職教師中，有的坦言由於教改不斷，教學負擔日趨繁重，自覺「不適任」教職，因而提前退休。據我所知，這些對教科書不斷改編、未來教學環境充滿不確定性感到不安的歷史老師，通常還是教學比較認真的教師，從另一方面來看，他們的退卻其實正是源於個人面對工作挑戰的自省。這些自覺「不適任」的教師的離去，令人在無奈扼腕之餘，不免興起更深的憂慮。對變局中的國中教育，對不主動進修、以不變應萬變、缺乏反省意識的老師，我們的教育機制能提供什麼協助或諍言？

從過去幾次教科書的改編可以發現，新教材實施之初，或因教材架構變動，或因內容較為陌生，教師最初對新教材通常有些排斥，等到教過一段時期之後，原來的陌生轉為嫻熟，新課本漸成舊教材。由於歷史知識的特性，過去歷史教科書再怎麼改編，基本的人物與史實終究變化不大，導致有些教師對大環境的變動渾然不覺，往往陷入慣性的教學模式而不自知。加上多年來考試領導教學的積弊，有些老師教學時以「劃重點」為務，重視的是訓練學生記誦標準答案的要領，久而久之，教師本身的知識結構似乎也項目化、刻板化。在八十七學年度各縣市舉辦的第一冊新教材研習會中，

筆者對若干教師教學慣性與歷史認知過於簡化的問題，曾有不少貼身的觀察，也提出一些善意的諍言。尤其值此九年一貫教改列車即將發動之際，歷史教師的教學方式更不能不有所改變。

以「社會領域」課程的實施來說，歷史教師除了必須具備本門原有的專業學識，還要注意歷史與地理、公民等學科知識橫向的聯繫與統整，由於過去的師資養成教育係按學門劃分，九年一貫新課程實施後，相關教育機構應針對合科的需要，建立現任國中歷史教師經常性在職進修的機制，自是刻不容緩的要務；而處於變局中的國中歷史教師，尤應積極爭取進修研習的機會，並在教學設計中降低對教科書的依賴，由教師本人扮演更主動、更核心的角色，以濟舊制下教學方式之不足。總之，一波波教改牽動的變局，強大「震波」所及，施教者與受教者一樣無一倖免，歷史教師與其心生退隱，不如透過自我成長，迎向未來的挑戰。



四、結語

自八十六學年度以來，我國國中歷史教育先後經歷「認識臺灣」新課程的實施、高中多元入學方案的執行、教科書統編本的廢除，以及即將上路的國中國小九年一貫制課程的定案，制度變易之快，令人目不暇給。作為「末代統編本」教科書編者之一，筆者與國中學生、歷史教師一起躬逢其盛，也由此深刻體會近年來教育制度的頻繁變動確與臺灣社會政治環境的快速變遷相為表裡，其間的扞格，實有待站在教育工作崗位的每一份子貢獻心力，妥為因應。筆者建議：一、當前的本國史教學宜暫時擱置中國／臺灣兩個對立主體的爭議，以現行部頒課程標準所界定的架構為規範，並將中國史的教學重點放在「臺灣文化的中國傳統」上面；二、國中歷史教師面對一連串的變局，應做好應變的準備，積極參與進修研習活動，在將

來的「社會領域」課程中扮演更主動、更關鍵的角色。此外，我們也衷心期盼各出版社正在編寫的九年一貫新教材，能一改數十年來國中國小歷史教學「各說各話」的積弊，使我國義務教育的新貌有一個令人鼓舞的開始。

註解

- ①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臺北：麥田出版，1999），頁273，九七年歷史教科書爭議事件。
- ②「民眾日報」，民國87年7月5日，六版。
- ③同前註。
- ④詳見許倬雲，「臺灣文化發展軌跡——寫在臺大『跨世紀臺灣文化發展研討會』之前」，「聯合報」，民國87年10月22日，14版。

